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历史回顾及经验启示

——基于外国来延记者群工作的视角

吴 锋, 贾思怡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 陕西西安 710049)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讲好红色中国故事是中国共产党成为百年大党的一条重要经验。延安时期外国来延记者群现象是特殊历史语境下中国共产党精心谋划、外媒记者积极参与的媒介化呈现和国际传播形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外国来延记者群的形成紧密相关, 其发展历程可分为初步试探期、全面探索期、持续跟进期和深化拓展期四个阶段, 呈现出“个体破冰引领、多领域协同跟进、多组团持续深入、名记者持续跟踪”的演进规律。中国共产党关于外国来延记者群工作的历史经验表明,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与广泛动员, 尊重来延记者工作的客观规律, 强化互信机制与文化认同, 发挥外媒名记者的桥梁作用。

关键词: 延安时期; 外国记者; 红色中国; 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19.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3) 05-0014-11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 国际传播能力是执政党治国理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讲好红色中国故事是中国共产党成为百年大党的一条重要经验。在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 党中央历来强调用好外部资源, 极为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一部党的百年奋斗史也是一部党的国际传播探索史。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思潮全球传播的产物, 自创立起就富有鲜明的国际化属性与广阔的全球传播视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我们党去塞求通, 借助共产国际力量在海外设立宣传机构;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我们党审时度势, 逐步建立起面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外宣传体系;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我们党开放拓新, 提出“积极主动、更加开放”的对外宣传方针, 形成“内外兼顾”的全新格局^[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我们党融通中外, 把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作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3]。综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国际传播史脉络,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成型期, 也是我们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成型期: 我们党探索出一条“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国际传播道路, 提出了国际传播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方法体系, 建立了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为核心的管理机构, 初步形成较为规范的国际传播组织与管理体系, 在党的对外传播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尤为要者,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开启了与外媒记者群打交道的伟大实践, 形成了与外媒记者群打交道的基本方略。在中国共产党实施积极的外宣方针, 以及共产国际和国际援华组织等大力帮助下, 外国记者跨越国家民族界限与政治隔阂, 通过官方邀约或民间来访等形式来到中国。他们忠实记录下延安风貌, 产出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图书著作、新闻报道、考察报告、回忆录、影音图像等“现象级”作品, 形成了极富影响力的“外国来延记者群”,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红色中国报道浪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魅力和红色中国形象首次登上国际主流媒体大舞台。这不仅粉碎了国内外的舆论封锁, 发展壮大国内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而且有力塑造了充满生机、积极进取的“红色中国”形象, 成功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初始基模。回顾与总结延安时期外国来延记者群的生成过程及内在结构, 透视延安时期我们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历史演进, 对做好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此, 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外媒记者打交道的历史演进轨迹如何? 党的外国来延记者群工作对当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有何启示?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历史回顾

1935 年到 1948 年, 延安是中共的精神中枢、组织中心和指挥中心, 也是对国际友人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区与控制区, 其在国际视野下经历着“红色圣地”与“红色威胁”两种认知的瞬息反复。^[4] 面对国内外极其严峻复杂的舆论格局, 中国共产党主动出击, 邀请一批又一批外媒记者来访, 在接待过程中提升与外媒记者打交道的能力, 逐步完善对外传播策略。与此同时, 延安时期特殊的抗战环境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外国新闻工作者, 既有驻华记者、自由记者、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中国通”, 也有临时为报纸与通讯社服务的作家、传教士、医护人员、军事家等, 他们也在客观上承担了记者身份并履行了记者职责。这些人都大大充实了“红色中国报道”队伍, 使得延安时期在华记者人数达到高峰。本文以抗日战争重大事件为关键节点, 并结合延安时期的中美关系、国共两党关系等外部环境变化, 融合中国共产党的外宣思想演变过程, 再结合外国来延记者群演化的阶段性特征, 把记者群的生成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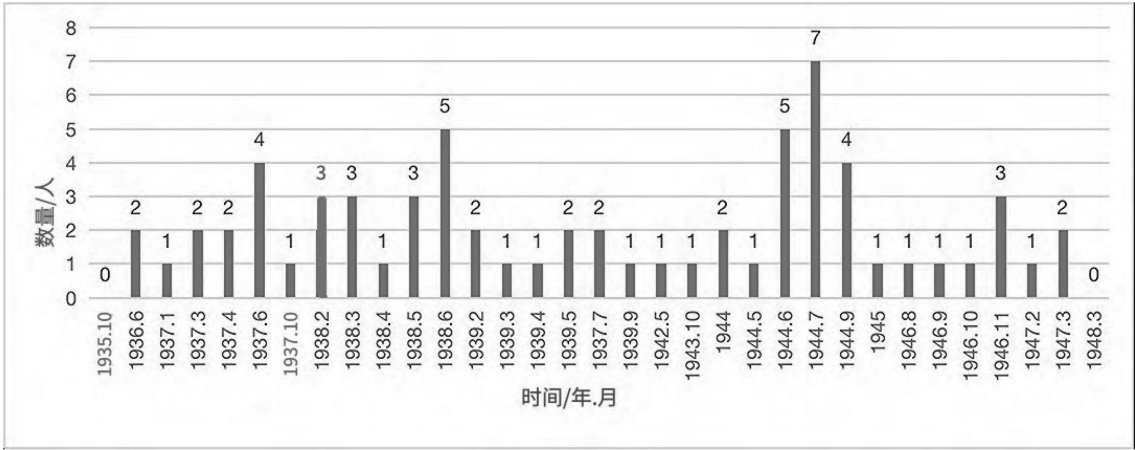


图 1 延安时期外国来延记者群数量变化图

(一) 初步试探期：个体破冰引领

初步试探期 (1935. 10—1937. 7) 是指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埃德加·斯诺的破冰之旅突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线, 逐步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信任, 率先形成“红色中国”报道风潮。外媒记者破冰来延事件是多方力量耦合促成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主动谋划和直接推动是主要原

因。面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舆论封锁、新闻检查制度，中国共产党急需扩大自身的海内外影响力，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创新性地主动邀请外国记者来延安访问。1937 年，中共中央设立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科，制定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招待方针。毛泽东非常重视外国记者的招待，来延安的客人，凡要求相见的他都尽可能答应。^[5] 在外国记者方面，因国民党的封锁，延安成为“未知之地”。虽然西方媒体和国民党刻画了中国共产党、红军和延安的负面形象，但斯诺却表示怀疑，“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他们从来没到过红色中国啊？”。斯诺对于边区存在一连串疑问，包括党的纲领、党的领导人、党的军队、党的抗战等各个方面。^[6] 新闻记者的敏感性、探求真相的职业精神、渴望冒险的刺激心理、对新闻成名的追求等促使斯诺等外国记者陆续来延安。在国外媒体方面，欧美主流媒体为争取国际新闻报道主导权、扩大新闻市场，大力支持记者来延采访。《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两家媒体积极赞同斯诺的西行计划并提供资金支持。在社会群体方面，宋庆龄成为连接斯诺和共产党的桥梁，张学良为他出具特别通行证，不少民间人士也认可此行的正义性，为斯诺西行之路保驾护航。

在中国共产党、欧美主流媒体、社会群体等多方的合力支持下，1936 年 6 月，斯诺成功突破国民党封锁到达红区。毛泽东几乎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同斯诺见面，二人曾多次彻夜长谈。在和斯诺的交流中，毛泽东首次向外界详细地披露了自己的成长过程和革命经历。在延安停留将近四个月 after，斯诺返回北平，并将他在红区的所见、所闻、所想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该书在伦敦一个月间连续印行 5 版，发行超 10 万册，在美国第一版销售量超 1.6 万册。当时美国报刊发表了 100 多篇关于《西行漫记》的评论文章，称之为“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闻奇迹”“本年度的杰出之作”“光辉的新闻成就”^[7]。

表 1 1935.10—1937.7 外国来延记者名单

编号	来延时间	姓 名	性别	国籍	形式
1	1936.6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男	美国	个体
2	1936.6	马海德（George Hatem）	男	阿拉伯	个体
3	1937.1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女	美国	个体
4	1937.3	安娜·利泽（Anna Liz）	女	德国	个体
5	1937.3	维克多·基恩（Victor Keene）	男	美国	个体
6	1937.4	厄尔·利夫（Earl Leaf）	男	美国	个体
7	1937.4	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	女	美国	个体
8	1937.6	托马斯·阿瑟·毕森（T. A. Bisson）	男	美国	《美亚》 杂志
9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男	美国	
10		菲利普·贾菲（Philip J. Jaffe）	男	美国	
11		艾格尼丝·贾菲（Agnes J. Jaffe）	女	美国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这一时期外国来延记者共 11 人（如表 1 所示），来延时间较为集中。美国记者是外国来延记者的主力军，美国《美亚》杂志是首批组团来延的媒体。埃德加·斯诺作为关键意见领袖的破冰引领作用突出，以事业和志趣为纽带的业缘人际关系是形塑来延记者职业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初见毛泽东时，

斯诺评价他“十足自信”“具有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面孔”,但对于毛泽东是否能得到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其仍保持怀疑。在与毛泽东多次深入交谈后,斯诺打消了疑虑,认为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有一种在必要时当机立断的魄力,是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6](63-78)}。同样,面对周恩来的自由访问承诺,斯诺怀疑太过理想,但中国共产党用真诚的待客态度与便利的采访环境打消了斯诺的疑虑,斯诺也自觉成为延安的“传声筒”。托马斯·毕森在他的《1937,延安对话》一书中写道,共产党领袖们强调民族大义,他们的举止言谈无不透露出异常乐观的情绪。延安也充溢着自信,它所留给我们的那种强烈且经久持续的影响并非仅仅是各式各样的活动,而是那些活动本身所携带的一种精神力量。^[8]在经过数月的观察后,斯诺承认自己曾隐约把红军视为“草莽英雄与反叛者”思维的错误,并借用荀子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来形象比喻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鱼水之情。^[9]在接待斯诺、美亚小组等首批记者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初步形成了与外媒记者打交道的能力,为后续扩大外媒记者接待范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全面探索期：多领域协同跟进

全面探索期(1937.8—1940.10)是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皖南事变之前。得益于国内外政治环境的积极变化,外国来延记者数量快速增长,多重因素耦合促成了外国记者来延报道的繁荣局面。从国际环境看,中国成为牵制日本侵略的主要力量,战略价值上升,国际上主张援华的呼声日趋强烈^[10],中国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新闻热点”,为记者来延提供了良好的舆论空间。从国内环境看,国共两党迫于形势达成统一战线,国民党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封锁有所放松,甚至还对中国共产党委以重任,为记者来延访问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中国共产党方面,我们党入驻延安后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积极扩大外宣队伍,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信息。毛泽东明确提出:“要组织各地方党组织首先建立对外宣传机关,这甚至比建立党部还重要。”^[11]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时局宣言,明确提出要扩大国际宣传和增加国际援助。1938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当前的国际宣传工作过于薄弱,对外宣传工作正式提上日程。^[12]1938年4月,周恩来领导成立隶属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成立的外宣领导机构。随即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主要任务就是展开对外宣传工作。邓小平也指出要大大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把边区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改变“打哑巴仗”的现象。^[13]对于外国记者来说,以斯诺为引领的西方记者的报道让延安不再是中国西北角的未知之地,而是“值得冒险的新世界”这一看法已成为国外记者的共识。

表 2 1937.8—1940.10 外国来延记者名单

编号	来延时间	姓 名	性别	国籍	形式
1	1937.10	詹姆斯·贝特兰 (James Bertram)	男	新西兰	个体
2	1938.2	王公达 (George K. T. Wang)	男	美国	个体
3	1938.2	查理·希金斯 (Charley Higgins)	男	美国	个体
4	1938.2	伊洛娜·拉尔夫·休斯 (Ilona Ralph Hughes)	女	瑞士	个体
5	1938.3	霍尔多·汉森 (Haldore Hanson)	男	加拿大	个体
6	1938.3	罗辛格 (Lawrence K. Rosinger)	男	美国	个体
7	1938.3	琼·尤恩 (Jean Ewen)	女	加拿大	个体

续表

编号	来延时间	姓 名	性别	国籍	形式
8	1938. 4	汉斯·希伯（Hans Heber）	男	加拿大	个体
9	1938. 5	沃尔特·斯伯哈德（Walter Sperhard）	男	瑞士	个体
10	1938. 5	阿·斯蒂尔（A. D. Steel）	男	美国	个体
11	1938. 5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	男	美国	个体
12	1938. 6	乔治·艾温·何克（George Irwin Hook）	男	英国	个体
13	1938. 6	莫莱·雅德（Molly Yard）	女	美国	世界学联代表团
14		詹姆斯·柯乐满（James Klugmann）	男	英国	
15		白乃德·傅路德（Bernard Floud）	男	英国	
16		尼尔·雷克南（Neil Raikkonen）	男	加拿大	
17	1938	比得·弗来敏（Peter Fleming）	男	英国	个体
18	1939. 2	伊戈尔·维津（Igor Uyzhin）	男	苏联	个体
19	1939. 2	罗伯特·马丁（Robert Martin）	男	美国	个体
20	1939. 3	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	男	加拿大	个体
21	1939. 4	薛立登（Sheridan）	男	美国	个体
22	1939. 5	乔伊·霍默（Joy Homer）	女	美国	个体
23	1939. 5	罗曼·卡尔曼（Roman Karman）	男	苏联	个体
24	1939. 7	乔治·菲奇（George A. Fitch）	男	美国	个体
25	1939. 7	陆慕德（Maud Russell）	女	美国	个体
26	1939. 9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男	美国	个体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因史料缺失，部分记者来延时间未精确到月份）

全面探索期外国来延记者人数最多，来延时间最为集中，外国记者多领域协同跟进特征突出。这一时期的外国来延记者共 26 人（如表 2 所示），基本形成覆盖主要发达国家的外国来延记者网络。外国来延记者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苏联、英国、瑞士等五个国家，来自宗教、文学、医护等多领域的自由记者（特派记者、自由撰稿人等）大大丰富了记者群结构，而世界学联代表团来延采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詹姆斯·贝特兰是首位以英国媒体记者身份访问延安的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时任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他对毛泽东给他留下的初次印象颇觉意外，认为他“有种知识的力量和卓越的威仪”“尤其是毛泽东那孩子气、顽皮而极富感染力的愉快心情，同听到的‘铁布尔什维克’等传闻相去甚远”^[14]。在延期间两人多次深入交谈，对话内容以《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为题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内。通过对延安的考察，他做出“中国抗战的希望就在西北”的判断，并主动投入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中。由北平进入陕甘宁边区的法国军官乔治·乌尔曼（George Ullman）虽不是记者，但他通过对延安的细致观察，也形象地把边区描述成“五无的地域”，即没有乞丐、鸦片、卖淫、贪污和苛捐杂税。他认为，“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发展起来”^[15]。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与外媒记者打交道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外国来延记者的规模迅速扩大，报道内容与倾向趋同，对红色延安的理解

和认同也大幅提升。

(三) 持续跟进期: 多组团持续深入

持续深化期(1940.11—1945.7)是指皖南事变至抗日战争全面胜利时期。由于国内外环境巨变,外国来延记者群的发展经历四年停滞又重归正轨。从国际环境来看,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南下横扫东南亚,威胁欧美等国在远东的利益,而中国成为亚洲战场牵制日本的主要力量。因此,欧美国家非常关注中国政局稳定,并提供舆论和物质上的帮助,支持外国记者到边区进行考察。从国内环境来看,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与新闻隔离措施,严禁外国记者到边区采访,红色中国又一次消失在国际视野,来延记者进入“空窗期”。政治形势之紧张,敌我矛盾之尖锐,党派斗争之激烈,要求我们党统一对外宣传口径及采取慎重处事的态度,一切宣传工作均应服从党的政策和中央决定。^[16] 党中央两次发文,明确中共中央在对外宣传上的绝对领导权,未征得中央同意的新闻稿件一律不准随意发表与广播,确保在外宣口径上步调统一。^{[16]〔120〕} 1940年10月,中共国际宣传委员会成立,专门面向国外介绍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事迹与根据地建设情况。1941年5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具有根本性质的纲领,其明文规定“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后又制定“来去自由、关心与尊重、生活上优待”等外交政策。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会统一管理边区与根据地的宣传工作和出版事业。通讯社是对外宣传的主要渠道,电台广播是各抗日根据地对外宣传最有力的武器。1944年,新华社成立英文广播部,延安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向全世界。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和围绕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制定的系列外交政策,将中国共产党和延安推到了世界舆论的中心,外国记者来延的通道也得以重建。1944年,冈瑟·斯坦因等大批在重庆的通讯记者们联名致信蒋介石要求访问延安。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已经掌握了抗日战争的主动权,同意记者访问延安可彰显其开明的一面。^[17] 同时,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热烈呼吁全党各界人士与英美人士广泛接触。1944年初,国民党批准美英等国记者前往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纷纷致电表示“诸位来延,甚表欢迎”^[18]。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访问,指出,介绍工作要积极主动,既要全面又要实际;在生活待遇上对中外记者既要一视同仁,又要区别对待,把外国记者的接待工作作为重点。毛泽东还着重指出宣传工作的基本方针,“要实事求是,介绍成绩也介绍错误与缺点,切不虚张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要善于求同存异,我们交的朋友才会更广泛,更深入”^{[5]〔6〕}。据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统计,“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共发电讯100多篇,向大后方和全世界较为客观、真实地描述了我党的抗日主张,以及边区和敌后军民的抗日伟绩。^[19]

1944年6月,罗斯福特派副总统华莱士为特使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内容就是允许美军军事观察组进入延安,其根本目的是考察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军事潜力。这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共产党地区的美国官方代表团,蒋介石不得不对美国作出让步,“勉强批准”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20] 中国共产党对观察组采取主动争取和热烈欢迎的态度,《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标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并称观察组的到来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为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21]。毛泽东为保证美军观察组的安全抵达,亲自致电负责人交代延安机场降落的细节。^[22] 周恩来亲自主持观察组的接待工作,明确要求各单位必须由主要负责的同志亲自接待,并为记者团安排宴会聚餐、音乐晚会、新闻业务座谈会、文艺座谈会、敌后战场报告会等,以便记者全方位了解延安。1944年8月毛泽东《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对外交工作的实施原则做了具体指示,明确提出,“欢迎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对稿件不予检扣,并给以各地访问之便

利”^[23]。这些举措大大增加了国际友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

表 3 1940. 11—1945. 7 外国来延记者名单

编号	来延时间	姓 名	性别	国籍	形式
1	1942. 5	彼得·伏拉迪米罗夫（Peter Vladimirov）	男	苏联	个体
2	1943. 10	班威廉（William Band）	男	英国	个体
3	1944	梯尔门·杜丁（Tillman Durdin）	男	美国	个体
4	1944. 5	林迈可（Michael Lindsay）	男	英国	个体
5	1944. 6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	男	波兰	中外记者 西北参观团
6		冈瑟·斯坦因（Gunther Stein）	男	英国	
7		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	男	美国	
8		莫里斯·武道（Morris Budo）	男	美国	
9		N·普金科（Pukinko）	男	苏联	
10	1944	科马克·沙纳汉（Cormac Shanahan）	男	苏联	个体
11	1944. 7	N. 普罗森科（N. Protsenko）	男	苏联	个体
12	1944. 7	包瑞德（David D. Barrett）	男	美国	美军观察组
13		约翰·S·谢伟思（John S. Service）	男	美国	
14		高林（John Colling）	男	美国	
15		彼得金（W. J. Peterkin）	男	美国	
16		艾默生（John K. Emmerson）	男	美国	
17		有吉幸治（Koji Ariyoshi）	男	美国	
18	1944. 9	卡萝尔·卡特（Carolle J. Carter）	男	美国	个体
19	1944. 9	布鲁克斯·爱金生（Brooks Ekinson）	男	美国	个体
20	1944. 9	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	男	美国	个体
21	1944. 9	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男	美国	个体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因史料缺失，部分记者来延时间未精确到月份）

这一时期外国来延记者共 21 人（如表 3 所示）。1944 年后，来延人数呈快速扩张走势，且受政治因素影响，个体引领特征弱化，“组团来访”趋势明显，业缘人际关系与地缘政治关系强化了多组团持续深入特征。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边区深入接触后，记者们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开放胸怀与自信态度，对延安进行了客观、真实又生动的报道，对解放区发出了由衷的赞美。冈瑟·斯坦因也直言，“共产党人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热心或善于宣传，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似乎是：用你们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我们”^[24]。科马克·沙纳汉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抱有敌视态度，在政治上亲近国民党，但在深入延安考察后，亦认为边区是好的，后又在《益世报》上撰文批评国民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歪曲报道。^[25]延安军民给美军观察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呈现的精神风貌与国统区的迥然不同，谢伟思等人在军事报告中断言：未来的中国属于中国共产党，蒋的封建的旧中国不能长期与华北的一个现代化的、有活力和由人民拥护的政府并存。^[26]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与外媒记者打交道步入规范化和持续跟进的

时期, 党中央基本形成了接待和引导外媒记者来华报道工作的制度规范及管理体系。

(四) 深化拓展期：名记者持续跟踪

深化拓展期 (1945. 8—1948. 3) 是指抗日战争全面胜利至中共主动撤离延安时期。这一时期因解放战争爆发及东西方世界间的冷战拉开帷幕等原因促使“盟国记者解散速度甚至超过凯旋军队的复员速度”^[27], 抗战时期群星璀璨、佳作迭出的局面不复存在, 来延记者群数量缓慢回落, 但仍有斯特朗等名记者深入延安, 见证中国革命的巨变, 进一步提升了红色延安的国际影响力。从国际环境来看,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 日本对美国在远东的威胁大大降低, “联苏扶蒋溶共限共”政策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推行, 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再次紧张。从国内形势来看, 国民党欲挑起内战, 战争枪口直指革命圣地延安, 延安再次陷入舆论危机, 外国记者进入延安困难重重。但中国共产党重视对外宣传的传统已形成。1946 年, 在新华社元旦给各地总分社及分社的指示信中就明确提出, 报社每月要供给专用于对外宣传的稿件一二篇, 以及适用于英文广播的通讯稿, 还要团结各方写稿, 邀请有名的学者、作家与记者等撰文能使对外宣传生色不少。^{[16] (172-179)} 就记者个人来说, 敌后抗战的情况与国共两党的发展成为新闻热点, 记者们访问延安试图解析国共内战真相。在多重复杂因素作用下, 来延记者数量逐渐回落, 中国共产党于 1948 年 3 月主动撤离延安, 来延记者的来访至此也完全结束。

表 4 1945. 8—1948. 3 外国来延记者名单

编号	来延时间	姓 名	性别	国籍	形式
1	1945	约翰·罗德里克 (John Roderick)	男	美国	个体
2	1946. 8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Anna Louise Strong)	女	美国	个体
3	1946. 9	阿·斯蒂尔 (A. D. Steel)	男	美国	个体
4	1946. 10	李敦白 (Sidney Rittenberg)	男	美国	个体
5	1946. 11	盖恩·奥康纳 (Gaine O'Connor)	男	爱尔兰	个体
6	1946. 11	马可·盖恩 (Mark Gayn)	男	加拿大	个体
7	1946. 11	福斯特·黑利 (Foster Hailey)	男	美国	个体
8	1947. 2	玛格丽特·史丹利 (Margaret Stanley)	女	美国	个体
9	1947. 3	乔治·霍格 (George Hogg)	男	英国	个体
10	1947. 3	诺门·裴索思 (Norman Pessos)	男	不详	个体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因史料缺失, 部分记者国籍不详)

这一时期共有 10 名外国记者来延安 (如表 4 所示)。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 来延人数大幅度下降, 甚至跌至低谷, 但迎来了享誉世界的名记者。斯特朗在第 5 次到中国时访问了延安并采访了毛泽东。在与毛泽东深入交流后, 斯特朗被他直率的谈吐、渊博的学识、诗意的描述所折服,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传遍世界。^[28] 思想激进的斯特朗感知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富有生气的力量, 她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传话筒与代言人, 将自己与中国革命深深地融合在一起。马可·盖恩在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 10 个小时的谈话后, 感觉到自己是跟一位真正伟大的人物在一起, “一个有意志力忍受延安这种困难和危险的人, 是不会失败的”^{[14] (203-205)}。1946 年, 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再次访问延安, 并就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等问题与毛泽东会谈, 谈话内容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访问延安后, 斯蒂尔也深有感触, 认为中国共产党常说的“为人民服务”是货真价实的; 中国共产党最常提到的是“人民”“中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人的口号是“到人民中间去”“向人民学习”。^[29] 来延记者以自身在延安的见闻与感受向世界阐释伟大的延安精神。总体而言, 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与外媒记者凝聚共识、深化交流的拓展期,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稳步推进。特别是依托名记者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这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宣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外国来延记者群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主导、外媒记者积极参与的一次媒介化呈现与国际传播形构。外国来延记者群并不是一个组织规范的整体，他们对华的态度与情感差异也非常大，尤其是面临专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抉择，记者群的队伍也愈加复杂与多元。^[30] 需要说明的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记者来延采访参观本质是一场政治传播行为。一是由政府指派特定记者组成的对外新闻网具有高度选择性，是服务于“向国际传递红色中国故事”这一根本利益的，获得礼遇的记者们大多是所属媒体机构与中国政府有着友好关系，或者他们的政治背景与对华态度符合当时需要。^[31] 毛泽东要求选择“可以信赖的外国人”来访问根据地，斯诺又被宋庆龄看作是有私交且值得信赖的、对她亡夫的事业表示友好的记者，这促成了斯诺的红色之旅。^[32] 二是对外宣传稿件具有高度选择性，对德日及附庸国家的报道着重揭露其法西斯主义暴行，对苏联与欧美人民的报道凸显进步人士反法西斯的言论，除了塔斯社，其他社可以自编新闻，但对路透社、合众社则须择别。^{[16] (137)} 但同时，中国共产党也给予来延记者采访自由权，相对的自主性也使他们在对中国的报道中自由地表达浪漫主义情感——选择他们“自己眼中”的中国。海伦·斯诺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从1937年开始访问这座城市的十年里，在延安的窑洞和山区产生了全新的民族传说和民族神话，产生了一种围绕毛泽东的新的信仰。^[33] 这一时期，一是记者们对红色中国的认知经历了由冒险到同情的过程，其本身也完成了从“局外人”到“参与者”角色的转变，来自红色延安的报道在国际社会备受关注并成为主流；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传播能力逐步完善，借由“他者”讲述的延安故事、塑造的中共领导群体形象、传扬的延安精神三者共同构成对外宣传的内容结构，实现了他者叙事与自我意图的合一。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经验启示

在党的百年国际传播历程中，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外国来延记者群工作是特殊历史语境下中国共产党精心谋划、外媒记者积极参与的媒介化呈现和国际传播形构，是我们党主动借势借力从外部打破国际传播旧格局、开辟外宣工作新局面的历史见证，体现了我们党外宣工作从“打哑巴仗”到借助“他者”声音讲述中国故事的转变，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与红色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能见度、话语权与影响力。外国来延记者群现象是红色中国建构的历史旁证，它拉开了“红色中国”传播的大幕，创造了“红色中国”传播的奇迹。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新闻外交、公共外交的成功实践，而且是我们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经典范例。党的百年政治传播史表明，加强政治传播在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事关党的政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民心基础、文化支撑与形象塑造。^[34] 当前，国际舆论形势空前复杂，意识形态斗争尖锐，这与延安时期我们党面临的舆论困境有相似之处，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外国来延记者打交道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占领国际传播制高点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广泛动员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延安时期之所以产生外国来延记者群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党中央形成了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以及一套与外媒记者打交道的方法体系。在领导机制上，党中央明确了“党管外宣”的基本原则，从接待科主管接待，到中央宣传委员会全面统筹宣传工作，对外宣传逐步走上正规化道路。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共产党坚持高扬真理、实事求是、开放包容、以诚相待的外宣原则，创造性提出了“正面宣传、求同存异”的外宣方针，明确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根本任务，提出了利用外国记者来讲中国故事的独特方法，做到外宣工作与政治、军事斗争相结合，进而扩大了政治影响力，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舆论认同。在沟通策略上，中国共产党敞开大门，既给予外媒记者充分的报道自由，又能精准拿捏尺度、坚持原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党的领导人以身作则，亲自部署并直接参与接待活动，针对性地配合记者们的采访活动，主动提供新闻素材，其真诚、坦然、开放的态度深刻改变了记者对于延安的旧有认知，赢得了外国记者们的赞赏与尊重。新时代，在推动中国故事的全球化表达过程中，

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对外宣传工作体系,以开放包容理念为引领,以真诚沟通为实操策略,主动设置议程,把握报道主动权,客观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和精神力量。

第二,尊重外国来延记者及国际传播的客观规律是延安时期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前提。对外宣传要符合新闻传播基本规律,方能取得传播效果,实现传播目标和宣传价值,发挥公共外交功能。^[35]利用外媒记者讲好红色中国故事是开展国际传播的重要路径,但不能急于求成,必须坚持循序渐进原则,把握好节奏,特别是要用好外媒记者之间的口碑传播效应,不断扩大来延记者“朋友圈”。延安时期外国来延记者群的形成是多方要素耦合作用的结果,体现了阶段性与渐进性的辩证统一。阶段性表现在外国来延记者群数量变化明显,呈现出“个体破冰引领、多领域协同跟进、多组团持续深入、名记者持续跟踪”的特点;渐进性表现在外国来延记者群发展呈现出波浪式、递进式前进的特点,来延记者时间维度上的前后继承、内容维度上的互相补充与认知维度上的日臻完善是历史渐进的必然结果。新时代,领导干部要弄懂国际传播规律,提升与外媒记者打交道的能力,从根本上解决本领恐慌问题。同时要创新传播手段,善于利用人际关系构建国内外媒体记者联络群,发挥人物、作品、口碑与效果之间的连带与叠加效应。

第三,构建互信机制与文化认同是延安时期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引导和真诚感召下,外国来延记者群对红色延安的认知经历了怀疑、同情、理解、认可等阶段,最终构建起以理解红色文化、客观展现红色中国为核心的互信机制,进而超越了欧美传统媒体的认知偏见。延安时期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搭建红色延安和外媒记者之间的互信机制,促进中西文化认同,推动外媒记者跨越中西价值鸿沟,最终构建起以客观报道红色中国、传递延安精神为共同旨趣,以同情或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为价值取向的“知华派”共同体,在西方新闻界形成一股报道红色中国的文化传统。“知华派”撕开了西方舆论封锁的牢笼,搭建起中外沟通交流的桥梁,具有强大的带动力、辐射力,增强了红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感召力、凝聚力,其影响延续至今。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要在尊重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做好与外媒的联结,强化中西文化沟通,主动引导外媒记者走进中国、感受中国,构建起中外媒体间的互信机制。既要讲中国特色故事,也要讲人类共通经验,更要积极回应外媒的对华关切,让外媒记者以更自然、易接受的方式报道,更能契合国外受众的思维方式与接受习惯,消除文化隔阂,构建起广泛的深层次文化认同。

第四,发挥外媒名记者的桥梁作用是延安时期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成功的独特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多名记者受邀再次访华,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名记者在海外发挥意见领袖作用,其国际传播实践也逐步从新闻领域扩散到大国外交与政治领域。当前,中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心,国际舆论博弈日益复杂尖锐,利用外媒记者桥梁呈现西方对华“多种声音”,报道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刻不容缓。因此要大力弘扬延安时期党的国际传播历史经验,加强与外媒记者的互动交流,成立延安时期外国来延记者基金会,加快外国来延记者群及其报道成果数据库建设,以此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推动中国故事的全球化表达,为新时代传递中国声音提供行动指南。今天的中国需要更好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国期待并欢迎更多外国媒体记者成为“新时代的斯诺”。^[36]

延安时期外国来延记者群活动是红色延安建构的历史旁证,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一是基于来延名记者报道活动留下了一批不朽的新闻作品。这些作品至今仍广泛应用于中共党史研究、中外政治关系研究、红色文化宣传与教育等领域,在国际交流合作中散发着恒久的红色魅力。二是基于延安时期来华名记者精神遗产而成立的基金会,如美国与欧洲相继成立的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史沫特莱基金会和斯特朗基金会等。2022年1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时任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主席的亚当·斯福特,希望基金会以斯诺夫妇为榜样,为促进中美友谊合作关系作出新的贡献。^[37]三是基于延安时期外国来延记者群及红色中国报道活动形成的一股独

特的文化传统。以斯诺为代表的外国来延记者群促成了西方报道红色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国际传媒界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知华派”力量。外国来延记者群事件不仅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成就显现,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标识,蕴含着开放包容的精神内核,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新华社.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EB/OL]. http://www.news.cn/politics/cpc20/2022-10/16/c_1129067252.htm.
- [2] 吴锋. 新中国 70 年国家领导人新闻发布: 机制嬗变、基本经验、完善方略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9 (7): 80-84.
- [3] 刘小燕, 赵蕊源. 联通中外: 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传播的基轴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8): 66-69+73.
- [4] 赵学勇, 王鑫. 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 (1934—1949)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4): 151-176+207-208.
- [5] 金城. 延安交际处回忆录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 678.
- [6] [美] 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 [M]. 董乐山,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1-2.
- [7] 刘国华, 张青枝. 《西行漫记》: 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一个典范 [J]. 党的文献, 2011 (3): 125-127.
- [8] [美] 托马斯·阿瑟·毕森. 1937, 延安对话 [M]. 李彦,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 43-46.
- [9] Snow, E. (1958).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London: Lowe and Brydone Printers Ltd.
- [10] 卢保婷. 中美关系中的美国主导性作用分析 [J].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15 (2): 54-56.
- [11] 毛泽东年谱: 中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124.
- [1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1 册 1936-1938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458.
- [1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26.
- [14] 华敏.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175-181.
- [15] Ghlmann, G. (1943). Land of five withouts. *Far Eastern Survey*, 12 (9): 86-89.
- [16]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 上 1921-1949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0: 98.
- [17] 裴晓军. 抗战时期美国在华记者与国民政府的合作与疏离 [J]. 国际新闻界, 2012 (1): 90-95.
- [18] 胡乔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332.
- [19] 王晓岚, 戴建兵. 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对外新闻宣传研究 [J]. 中共党史研究, 2003 (4): 59-65.
- [20] 费正清, 费维恺. 剑桥中华民国史 下 1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710.
- [21] 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N]. 解放日报, 1944-8-15.
- [22] 王纪刚.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工作的历史经验 [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9 (4): 81-88.
- [23]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 1943-1944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314-316.
- [24] [美] 冈瑟·斯坦. 红色中国的挑战 [M]. 马飞海,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79.
- [25] 孟红. 抗战时期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西北纪实 [J]. 党史纵览, 2008 (8): 20-25.
- [26] 陈子平.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始末 [J]. 陕西档案, 2006 (4): 40-42.
- [27] [美] 约翰·霍恩伯格. 西方新闻界的竞争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5: 544.
- [28] [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斯特朗文集 3 人类的五分之一 中国人征服中国 [M]. 傅丰豪, 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8: 250-252.
- [29] Steele, A. T. (1966).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 [30] 路鹏程. 论民国时期外国驻华记者与中国记者的合作与竞争 [J]. 新闻大学, 2020 (1): 53-71+126-127.
- [31] Song, Y & Lee, C. C. (2014). Embedded journalism: Constructing romanticized images of China by US journalists in the 1970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 (2): 174-190.
- [32] 芮必峰, 李嘉树. 西方记者探访和宣传“红色中国”的原因 [J].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4): 136-142.
- [33] [美] 海伦·福斯特·斯诺. 旅华岁月 海伦·斯诺回忆录 [M]. 华谊,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221.
- [34] 吴锋, 刘国强. 政治传播视域下党的二十大新闻发布实践范式、核心议题与制度创新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11): 1-9.
- [35] 高金萍, 李庆豪. 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专业化溯源及其效应分析 [J]. 未来传播, 2023 (1): 28-34+121.
- [36] 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N]. 人民日报, 2021-3-8.
- [37] 习近平复信美国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主席亚当·福斯特 [N]. 人民日报, 2022-2-8.